

罗先珂著

珞珈草

標初題



罗先珂著

珞珈草

樣初道
1924

武汉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罗先珂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后因积极参加当时的进步政治活动和学生运动，被迫离校，投笔从戎。这本集子中收集的文章，都曾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过。它们除了都是写于三十年代以外，还概括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生活和斗争，勾画出了他们的苦闷、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粗略的轮廓，因此，既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叶君健为本书写了序言，我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珞珈草

罗先珂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北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112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0279·7 定价：0.60元

151170



作者一九三六年在珞珈山

青春 的 脚 印 (代序)

叶 君 健

就个人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年纪越向老的路上发展，工作就越多，人也就更忙起来了。每天的事总是做不完：一件未了，新的又压过来了。当然这个所谓的“我们”，也就是指在我们人口中占极小比例的一部分所谓脑力劳动者，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现象是在党中央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出现的。引用这个集子的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话：“我现在退居第二线，反而更感到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做的事是那么多，更感到时间是宝贵的了。”“退居第二线”，是因为进入了老年，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反而是那么多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感到在我们有生之年剩下的光阴不多了，而“文化大革命”就浪费了我们几乎十年的时间。抓回已失去的大好光阴，就是我们忙的主要原因，在忙中我们当然就把许多过去的事情忘记了。

但读完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后，我的许多已经忘掉或不大再想的事情又生动地回到记忆中来了。因此，我对这些文章就既感到很亲切，又感到很新鲜，虽然它们是在三十年代写成的。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城市小知识分子的个人家庭生活 and 烦恼，直到抗击日本侵略的游击战，都有所描

述。从形式上讲，它们的体裁多样，有小说、散文、短评、随笔、剧本、游记、论文、歌词和通讯等等，还包括一篇翻译。它们有点杂，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除了都是写于三十年代以外，还概括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生活和斗争，它们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是中国人民充满了苦难的时期。帝国主义长期在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结果，是中国整个农村破产，工商业凋敝。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搞个人独裁和建立法西斯统治，以致日本军阀乘机乘虚而入，不费一枪一弹，夺了东北三省。他为了保存实力打内战，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使之华北沦陷，日寇展开全面侵华战争。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是很敏感的，他们感到亡国的危险，为人民的命运忧虑，因而起来“呐喊”。“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掀起来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掀起来的，作为“四人帮”下台先兆的天安门革命事件，也大部分是由中、小知识分子参加的。但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出现之前，他们不知经历了多少徬徨、苦闷、探索 and 追求。

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中成长起来的。小说《春天》中的人物就一直在徬徨、苦闷、动摇和自责中兜圈子。他们想为国家 and 人民做点事，但生活和社会环境又往往拖住他们不往前走，他们为此感到不安，但又要找出一些无法说服自己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这种矛盾在那时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但这种矛盾却又反过来推动他们反省，不得不向前迈步。正如《春天》里所说的：“他们尽情地议论着，回忆着，‘九·一八’那时罢课请愿的情形……他们又继续谈着最近的学生运动。客人又说明了他们第一件工

作的出版计划，意伟欣然应允着。——一件新的工作要开始了，从这工作里将发现自己的存在，他们一起感到新生的愉快，同时，对这种欺骗自己的生活加以诅咒”！

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曲折反复的道路上一退一进地向前走的，他们的“关”很多。正如《“三关”之外还有“关”》里说的一样，“关”是过不完的。不过，还是“‘关’越多越好呢，越凶越好呢！……‘关’会使你进步的，‘关’会使你变得勇敢、坚定、不动摇……”《且说屋里》这个剧本中那个汉奸包善卿的女儿大概就是过了不少这样的“关”，才最后参加了学生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她那个为虎作伥的汉奸父亲的示威游行。我在上面所说到的感到“亲切”，就是因为这个集子里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青年的苦闷、决心和战斗。至于说“新鲜”，那是因为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影响下，一直不敢相信当时绝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激流中居然也会那么勇敢地站出来，冒着严寒和警察的水龙头及棍棒，甚至冒着坐班房和杀头的危险，以挽救国家的危亡，维护民族的尊严，唤起民众的觉悟。他们居然也参加了创造历史的队列。

作者和我是同学，只不过低我两班。他在《后记》中提到的那几个年轻人的名字，如谢文耀、钱祝华和祝映璜，我也很熟，特别是谢文耀，还有个叫作林守正的同学，我们也几乎形影不离。谢文耀^①比我低一班，但同读外国文学，课

^① 谢文耀和林守正后来都参加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中牺牲了。

余他写诗，我写小说。在那远离市区、孤零零的珞珈山上，我们竟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还用外文创作，希望把中国人民的声音送到世界人民中间去，特别是世界弱小民族中去。希望以此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团结，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压迫者和剥削者。我用世界语写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本书作者罗先珂和我的交往就是从他为我的这部小说集画封面开始的。那时候我们都谙熟爱伦堡的名言：“一边是荒淫与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不论当时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多么天真，但我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想认真地做点有意义的也就是“庄严的工作”，用来反对那“荒淫与无耻”。

由于想做点“庄严的工作”，在那个黑暗的时日却也碰上了不少麻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用中文写了一篇散文，描述一个卖零工的碎石工人冬天在建筑工地上冻死的命运；该文登在外文系的刊物上。没想到，学校里居然有批“英雄”们对此“关注”起来，我于是就成了他们“做工作”即监视的对象。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我也就对“英雄”们那些时髦的东西开始有了研究，加深了认识，使我从中学得了不少的“政治”。“英雄”的种类很多，我们那个大学的“英雄”属于“民族英雄”这个类型。原来这个地区在蒋介石的眼里是他的大后方，这个大学是他培养信徒的根据地。他派来了几个原在黄埔军校当过他的学生的“英雄”再度来当大学生。这些人信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组织了一个“蓝衣社”来捍卫他们的“最高领袖”及其学说，以“复兴中华民族”，虽然中华民族在这个“最高领袖”的“不抵抗”政策下已经沦于危亡的境地。“蓝衣社”这个新鲜的名词，当然是来源于意大利的“最高领袖”

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理想”很是“宏伟”，蓝衣就是他们的“标志。”

但说来也奇怪，“蓝衣社”的“朋友”们却都不穿蓝衣，而喜欢穿西服。由于他们发展组织极为秘密（而且发展得相当快，每个系都有他们的“同志”），很不容易辨认，而要摆脱他们的“关注”，则必须首先把他们辨认出来。感谢他们的西服，这个问题终于很容易地解决了，因而探索他们的“秘密活动”也就不太困难了。甚至他们新发展的成员，也可以一目了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发展组织有一个范围：在那些专心读书的学生中，他们没有市场，只有在那些考试成绩勉强在六十分上下的人中，他们才能找到候选人。这类学生，说实在的，对“复兴民族”并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表示出了一定的“热情”，——为的是他们考试不及格、毕不了业时，这个“领袖”、这个“党”可以伸出救援之手，使他们得到文凭，还可以安排一个害人的一官半职，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每月所能领到的一批“活动津贴”。一个新入伙的“朋友”领到头一笔“津贴”时，一般总要换装——脱下长袍，穿上西装，因为要开始搞恋爱，追女同学了；他们得借助西服，摆出一点“气概”来。如果他们的活动有成绩，拉了几个人入伙，自己就当上个小头头。于是他们早晨便要跑到东湖边上去舞几分钟的剑，哼几句岳飞的《满江红》。这样他们“民族英雄”的地位似乎就确立了，他们的形象在同学中也变得鲜明了。

我所在的那一班一共只有七个同学，其中五位勤奋好学，钻进了书堆里。另一位不知以什么机缘，居然考取了我们这座堂皇学府，分到我们班里来。那时在外国语文系，从

二年级起讲课全是用英语，他当然听不懂；至于考试成绩，那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天他忽然穿上了新西服，俨然是一位洋绅士，这说明他的身份变了。为了报答购买这身西服的“活动津贴费”，他便和我攀谈起“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问题来。这里还可以附带提一笔，这些“朋友”并不害怕进步思想，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为信“异端”的人“改造思想”。有一位比我高一班同学，平时喜欢和一位“英雄”唱和一点“言志”的诗，表露出他对“领袖”“复兴中华”的怀疑。最后这位“英雄”和他摊牌说：“你的思想我们已经完全清楚了，你的出路是：要么你加入我们的组织，要么你去坐班房”。我的这位同学只好在当天深夜远走上海，还带走了一位估计不久“英雄”们也要与之摊牌的同学作伴，不久这位同学就病逝于上海。

我还没有达到必须远走上海的程度，由于我当时身无分文，吃饭都要赊帐，没有这种物质条件。我只好硬着头皮应付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向八大山人学习，装聋作哑，不仅不下珞珈山，连房门也不大出去了。但学校毕竟不是隐居的地方，珞珈山也不是桃花源，我每天还得在课堂和图书馆里露面，也许是由于当时神经高度敏感，我每次露面时，总觉得有怀疑的眼光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来。而就在那个时候，武昌和汉口的几位世界语朋友已经被抓走了。我除了思想上有点“异端”以外，还是一个“世界语者”，精神上就不能不有点紧张起来了，有时夜半听到房门外有脚步声，下半夜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眼望着直到天明，但为了求得一点知识，利用那个图书馆，这样的日子还得过下去，而且一过就是三年有余。那真是一个没有“歌”的青春！待“青春”唱出“歌”来的时候，那已是“一二·九”以后的事了，那时

我已经毕业了。

本书的作者在《后记》中说：“‘一二·九’在武汉打破了珞珈山沉闷的空气，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尽管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手段和方式来限制这个运动的影响，但冰块既然已经打破，严寒也就无法控制住奔涌的激流了”。这是本书作者比我低两班的好处，他有机会迎接这个新的局面，而且也有条件参加进去，进而推动这个局面向前发展。果然不久，“双十二事变”又发生了，“虽然武大的‘复兴社’（这是‘蓝衣社’的改称）不肯罢休，但毕竟有点象秋后的蚂蚱，锋芒收敛了一点。我就忙于公开工作……”，“公开”，这在心理上是一次多么大的解放！可惜我已经离开学校了。对于这个局面日本人也放心不下，急迫地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救亡成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党也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领导人民抗敌救亡。“公开”又转化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行动了，“青春”这时才算真正发出了“歌”声来。

从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听见这些“歌”声，虽然它们还比较零碎，但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象征着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起来了，“青春”才开始真正放出光辉。

作者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它们今天会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所走过道路上的一些脚印。第一篇“小小小说”发表时，作者只有十五、六岁，这正是我们那一代小知识分子开始走进社会、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开始苦闷、徬徨、探索和追求真理的时候。这个时期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活动，集子无意中勾画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说是有关那时我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献，可供我们

今天的年轻人参考。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小知识分子，本来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社会阶层或力量，但他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关键时刻，却也能起些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改变国家命运的作用。“五四”运动产生了新文化，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一二·九”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反饥饿”大游行促进了反动政权的崩溃。所以，青年们也不必过于小视自己，而应该珍惜自己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好好地使用它。这本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苦难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也许能提示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年轻人如何珍惜现在的条件，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

目 录

青春的脚印（代序）·····	叶君健（1）
八斤囡（小小说）（1933年）·····	（1）
海（散文）（1934年）·····	（3）
关于生活经验（短评）（1935年）·····	（6）
“三关”之外还有“关”（随笔）（1935年）·····	（9）
春天（小说）1936年·····	（13）
复课是需要的吗？（短评）（1936年）·····	（22）
且说屋里（话剧）（1936年）·····	（23）
日本马场财政之检讨（论文）（1936年）·····	（37）
黄鹤楼（游记）1936年·····	（52）
从入超减少说起（论文）（1937年）·····	（55）
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笔记）（1937年）·····	（62）
游击军（歌词）（1937年）·····	（67）
苏联退出“比会”与我国外交（短评）（1937年）·····	（68）
京山被炸毁了（通讯）（1938年）·····	（70）
他们正准备着向敌人出击（通讯）（1938年）·····	（73）
大洪山的游击队（通讯）（1939年）·····	（76）
托尔斯泰的出走、罹病和逝世（译文）（1936年）·····	（82）
后记·····	（134）
补记·····	（149）

八 斤 囡（小小说）

当八斤囡呱呱堕地之后，她的父母和兄姐，一家人都沉沦在失望的深渊里了！

八斤囡是一个贫农家的第九产了。她已有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一家子都得无间寒暑地在田野间工作。在从前，遇着年成好些时，也还能有相当的盈余存积起来；近年来，因为各处的经济恐慌，农人们虽遇到了丰收的年成，而结果倒反不能有一个温饱。所以八斤囡的生育，实在只有使他们更穷困些罢了。并且在这农忙紧张的夏天分娩，更给他们多添了不少直接间接的损失。

在S镇的北市梢，居住着一个小康的家庭，它的主人在物质上的享受是很满足的，只可惜膝下无儿，虽然这主人曾娶了两个妾。

他们只得准备秘密地向远地招领一个婴儿，作自己的亲儿来承继他们的产业。

为了避免人家的藐视，她——第二妾——假装着怀孕的模样，只等着有一个刚出世的婴儿能给他们的时候，她便可以假装着分娩，使别人相信这婴儿确是她的亲生儿子。

在八斤囡未脱离母体之前，长生——这婴儿的爹——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并且知道还有二百块钱的补偿。这，使他们衰颓的脸庞上能不泛着些内心的微笑吗？她，八斤囡的妈妈阿三妹，不时地抚摸着自已的膨大的腹部，低头瞧着褴褛的衣衫，两种不同的意识在她的内心深处不断地交战着。她想：啊！这是自己的肉呀！唉！这是第九个苦命种了！过去的八个不

是也终究养活了吗？难道这第九个就不能拖大来？啊！这是自己的肉呀！让这第九个也跟着我们苦就苦一些地成长吧！

但另一个念头，象闪电般闪过了她的心灵：他还有更多的力量来养活这第九个吗？他是太辛苦了！好，索性送给那个富家吧！还可得一笔大款子呢！……她出神了，愉快地微笑着。

虽然是深夜了，但暑气却还没有消去，蚊虫嗡嗡地飞，昆虫的鸣声从外边声声传来，孩子们早就入睡了。

阿三妹靠墙坐着，嘴巴很大地张开，嘴唇没有半点儿血色，那迟钝的眼睛，仿佛凝视着不可知的远方，忧郁而显得可怕。她双手按住膨胀的腹部，突然觉得一阵痛，一阵剧痛……

在他还没有走到产婆那边的时候，孩子已呱呱堕地了。这是一个浴在血泊中的小生命，她挣扎着，她幽微地哭着。

猛然地她想起他曾说过那富家要的是男的，女的就不要。她连忙推开她的小腿，看看是男还是女，痛苦把她热烈的希望驱除得无影无踪。

“呵……”失望使她开始痛极而昏过去了！

“怪肥大的，长生，千金！你有福呵！”产婆一边洗着孩子，一边望着长生笑着说。

他瞪着眼，一会却又象发狂似地在孩子身上用力一捺，想一下把她窒死，孩子却哇哇地叫了起来。那哇哇的叫声，呵！刺醒了伟大的母爱。她，阿三妹，急切地叫着：“喂，……不……”孩子便从产婆的手里递到了母亲的怀里。

这可怜的小生命就这样开始了她那困苦的生涯。

在她出世后一天，长生称得她的重量恰是八斤，于是她便被叫做八斤囡。

1933年，

原载1933年《中学生文艺》

海（散文）

那不象是海，那简直是一片空旷。真的，要不是远处树着几艘帆船和大轮船的轮廓，我真不相信这便是海了！

远处，海水成了土黄色的一条堤，不象是平面的，直横着一线，从望不见的一边到望不见的另一边，成了微圆的一条带。近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因为潮水才退，只留着这一片水渍，象大理石的台面，而远处的海水却成了围着的圈子。

天和水很分明地分着界线，天是青的，海水是土黄的，但仔细地看时，又会发现在这交界上边，却浮着白的云霞，就在这白色云霞的隙空里，刻着轮船的烟突和帆船的黑影，清晰地又是模糊地充满了和谐的美。

几只海鸥飞过了，矫健地鼓着双翅，庄严地唱着嘹亮而清脆的“歌”。“好大的海鸟呀！它们能飞过这么大的海的‘平原’吗？它们该早已习惯了海的怒涛和汹涌的巨浪吧？它们从小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呢！”我不禁沉思起来。

伟大呀！看着这无边无际的海，我心底泛起了微笑。

我们决定下海去，赤了脚，把鞋袜和一本《译文》留在岸上。

我们先走到一伙捉蛏的青年人那边，看着他们把微尖的棒端从小洞处插下去，再把细钩很轻易地钩了出来。我和茜高兴地要来试一试，竟几次都失败了！他们却同声地笑着说：“你们是先生呢！”我不禁羞涩起来。

我们再向外跑，踏着水片，溅出水花，海风吹在裸着的脚上，真觉畅快之极。

海底的泥是很有趣的，上边盖着一层沙，被海水冲成了有规则的纹，一曲一弯地走上去绝不泥泞，反而觉得软绵绵的，但在这下面却是污泥了。

走着走着，同三个渔人谈了会话儿，他们正在张网，因为傍晚海潮又要来了。看着他们工作中紧张的脸，另一种的情意通过我的感觉，脸上不禁热烘烘了。

海水就在前面了，土红的颜色，象躺着的一般。平静啊！这海是太平静了，平静得有些寂寞。

我们很高兴地插足在海水中了，在这微动的水波里，海象要来冲击我席卷我一般，心中一阵害怕，头立刻晕了，象站不稳似的，我连忙退了回来。

一阵子心头的悸动和着一阵子笑，我立刻意识到我的懦弱，觉得我是连平静的海都不敢正视一下的。

正当这时，脚下的泥似乎有些松，茜的脚已陷了下去，他惶恐地喊着，可是污泥已陷到他的小膝上了。我连忙把他拖住，可是我自己的脚背也已下去了。茜慌了，好容易才挣扎着脱离这陷阱，脸涨得红红的，不自然地笑着。

我也笑着对他说：“你读过雨果的《沙葬》吗？他昭示我们人生是得刻刻留心着的，当你步入了这些境遇时，不容忏悔，不容徬徨，人已被沙陷阱了呢！”

他也只笑了笑，不说什么，忙着洗去污泥。

又是踏着水回到岸上，茜不象来时那么唱着歌高兴了，只是默然，大概在提防着会有第二个松沙真的会把他陷下去吧！

到了岸上，我还想贪婪地再望一下海，于是在芦根地上